

性名的烦恼 中国的穷吃 职称大“拼搏” 中国人的隐私 丐帮漂流记 辞职者

女性自杀问题窥探
报告
关于厕所及其诸事的
名片

丑闻

職稱大拼搏

刘茵 主编
華藝出版社



中國熱點寫真叢書



涉外婚姻十年 南北奇婚录 性问题采访手记

人贩子与野蛮的婚姻 当代女性世界的性爱观念 大饭店里飞舞的红蜻蜓

職稱大拼搏

《當代中國熱點寫真叢書》多為報告文學名家之作，以大量鮮為人知、驚心動魄的社會新聞，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色人物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到工農業的巨變、經濟特區的繁榮、洋行裡的雇員、城市中的小保姆、儀態萬方的美女、腰纏萬貫的個體戶、五光十色的都市、光怪陸離的音像、多姿多彩的服裝、神秘的監獄、歌潮舞潮的興起、股票市場的衝擊、少男少女的隱秘世界、中年男女的情感躁動、老年人的黃昏之戀、軍人的綠色羅曼、獨身女人的心態、未婚同居者的咏嘆、跨國婚戀的悲歡……你還想知道什麼？吃喝風？漲價風？商品質量？職稱拼搏？戶籍、保險、吸煙、車禍？這是一面多棱鏡！這是一幅百態圖！一套書在手，盡知中國情！

華藝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书名: 职称大拼搏

主编: 刘 茵

出版: 华艺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密云双井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221 千字

印张: 10.25

版次: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ISBN7-80039-735-1/I·312

定价: 6.20 元

目 录

职称大拼搏	胡 平(1)
上帝在呼号	长 江(40)
中国人的隐私	张世黎(62)
丐帮漂流记	贾鲁生(97)
中国人的穷吃	邓晨曦(155)
人间有一怨	
——关于厕所及其诸事的报告	姜惠林(186)
中国户籍大透视	任贤良 田炳信
	黄国文 李升旗(224)
疯狂的海洛因	胡展奋(236)
女性自杀问题窥探	王灵书(280)
姓名的烦恼	刘一达(317)

职称“大拼搏”

胡 平

—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清楚，在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的竞争，究其根本，是各国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之间的竞争。党中央顺时应势，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并在这些年制定了不少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执行起来还常常形成不了一场透雨，或者只是在某些时候（比如教师节、上级来检查组），对某些人（比如统战对象、知名人士）表现为雨点颇大；尽管自“文革”以来红卫兵小将、贫下中农、工人、解放军指战员，都轮流光荣了一遍，知识分子的光荣刚刚砌垒，而且这场光荣犹如一份骨头汤，实惠性的东西并不很多，还是有不少人嘟嘟囔囔的：当今“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

这是一个人们所获得的实惠与所发出的牢骚都空前多的时代。

这是一个人们往往在理性上痛痛快快接受、而一旦落到自己头上却又在感性上憋憋扭扭的时代。

— 1 —

这是一个被耽搁在动荡年月的很多事情眼下一定得抓紧办，而一旦毅然去办了又得冒百般风险、历千种困顿的时代。

也许，在中国，没有比专业技术职称的评聘工作更能折射出我们时代的这些特征了。

二

复旦大学建于1905年，是一所直属国家教育委员会领导的综合性大学，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她是文凭和成绩在欧洲、北美和香港得到承认的国内有限的九所大学之一，也是国家在“七·五”期间重点支持的少数九所大学之一。

与复旦大学的作用、影响、水平尚难成正比的，便是学校的教师高级职称名额指标了。虽然通过1985、1987年的两次评聘，仍难扭转这一现实：在同等的条件下，其他高校提升了，复旦却升不了。复旦有一位1984年毕业的研究生，分去上海的另一所高校后三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而在复旦，象这一档次的教师可谓比比皆是，要破格，就得提升一片。

国家教育委员会了解复旦大学及其相同类型高校的这一状况。可教委不会印钞票，能下达的所有职称名额指标，均是以国家拨给的有限教育经费作后盾的。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随着国家财力的好转和强大，复旦大学并不会较长时间地屈就在35%的高级职称名额指标上。当今校园里，虽不乏委屈者，却极少悲观者，谁都觉得希望好似一部精装烫金的原文世界文学名著搁在书架上，而现实正在一步步地翻译、注解它的美好与恢宏，毕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的九年，是复旦园里最好的一段时期。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位原本连初级职称也没有、一下子跳到副研究员的杨建文，他是一个 67 届的初中毕业生，考上研究生，已经是“三级跳”，这次评聘职称又来了个呼呼吸风的“三级跳”，他却并不“谦虚”，他说：“在我看来，象我们这样的人要冒一冒，就得实行跳跃战略。这是时势所迫。‘文革’耽搁了十年，如果什么都跟在人家后面按部就班，我们这批人就完了。‘文革’过去了十年，如果到我们这代人还要 50 多岁才能当教授，中国就没有年轻的教授了……”

杨建文的导师是知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家雍文远，他却“离经叛道”了，从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入手，再详细比较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然后再把中国现实的经济矛盾放在东西方的理论舞台上，从而抽象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寂寞伴案灯，甘苦寸心知，这是一个长达八年的外围工程，然后地基一旦清出，独特的理论个性与开阔的学术视野，便在上面构架起一座蔚为壮观的立体交叉桥。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教授评价道，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经济理论的一个空白”。

在该院，象杨建文这样 35 岁左右获破格提升的有 9 人。而据院、所两级评委会估价，学术水平已达到副研究员的至少还有 20 来人。由于“破格”名额限制，只好忍痛割爱了……

一方面引进了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又远未形成真正实行人才竞争机制的条件。处于这一夹缝中的没有“破格”的“合格者”们沉默了，然而这一沉默，是峨嵋盘山道上脚夫坚毅的沉默，是无影灯下医生和护士们毫不懈怠的沉默。“下次，该一定轮到我们！”在

上海社会科学院，处处可以感觉到一种犹如心脏般泼刺刺搏动的奋发意识。

在大连工学院，近几年在教学和科研中涌现出一批新生力量。按照湛容的《减去十岁》的算法，他们虽然年轻，但学术水平高，贡献突出，已成为各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为了使这部分人能在最佳年龄得到最佳使用，同时避免在一般评聘职称工作中所必然产生的矛盾，该院从1987年起，决定对40岁以下的优秀中青年教师评定高级职称实行“计划单列”，即单独下达一定数量的指标。方法是先由各系主任、导师推荐，院各学科评审组认真听取推荐理由，然后从各系推荐的5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17名举行公开汇报会，每人限十分钟讲述自己主要工作与成果。会前，张贴广告，欢迎全院教师旁听；会后，设立群众评议箱，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供评委们参考。

这17个人中，有的在国外进修后回国，有的是国内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更多的则是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年龄最小的王海山，也有36岁了，他原来是学化工的，后来靠自学当上了社科系自然辩证法教师，在科学学、技术学、自然辩证法等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讲了《科学研究方法学》、《发明学》、《科学学》等课程，他撰写的《科学研究中的移植法》等著述在国内具有开创性的水平。工程力学系女教师关东媛，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一直从事基础力学教学，她因教学质量高受到学生及教师们的广泛好评，并以讲师资格受聘担任该系尖子课程——材料力学主讲……

院评审委员会在认真听取本人汇报和学科组评议汇报

后，最后确认 11 名同志具有副教授任职资格，6 名同志具有副研究员资格。也许，因为名额依然偏紧，在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中，尚有遗散之珠。但是对这一茬人来说，能实行“计划单列”，就意味着对他们整体水平的认同；而有了这么一块被划隔开来的小小天地进行角逐与较量，就不啻是有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公正和权威……

过去的职称，不一定要与岗位相谋合；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必须根据工作的需要而设置岗位。在中南工业大学，过去每次职称评定后，就出现一次讲台换班，晋升到高级职称的教师纷纷离开讲台，“让位”给未评上高级职称的教师，于是出现了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的现象。1983 年上学期，全校开出 254 门本科生课程，正副教授只主讲 48 门，占 19%。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后，1987 年上学期，本科生课程的 44% 的教学任务，都由正副教授主讲。在北京大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前，全校基本课、专业基础课和研究生的必修课中只有 30% 由正副教授担任；现在已有 70% 以上由正副教授担任，加强了教学第一线，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

过去的职称，是“一锤定音，终身享有”。你有了教授、副教授称号，可以操起钻机，继续掘井，也可以双手统进袖里，靠在南墙上晒太阳；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是评聘结合，评上某种职称资格，还得根据你的资格相应地要求你达到某种工作量。你职称到手时的愉悦，乃至光荣感，须臾之间，就会化为沉甸甸的压力。而且聘任有任期，用人单位和被用人有应聘与拒聘、解聘与辞聘、续聘等权利，单位和个人均有了适度的活力与弹性……

对此，评上职称的该不会有多大异议。有该评上而未能

评上的，也许却不以为然。不说别的，明明实际水平够得上高级职称，到手的却是中级职称，你得承认是“贬值”了，是少“秤”了……

去集贸市场转转。瘦鲜肉标价4元5角一斤，你掏出9元钱，要买二斤肉。回家一复秤，却少了四两。你肝火大动。继而为白白亏了近2元钱而心头生痛。但事后再想，过去是兜里没有钱，也买不到肉，就是有了钱，除了买每月配给的半斤或一斤肉外，你踏破铁鞋也满城里找不到一个集贸市场。今天有钱，更有满目琳琅、红瘦绿肥的集贸市场，在这里，除去天上的核导弹、地上的熊猫肉，几乎你要啥就能买到啥，两个比较，最后你还得承认当今好……

这算不得是阿Q精神。而是一种对历史、对未来的总体把握，以及在此把握之上的，清风舒袖的豁达。

这是一个悖论。又是一个怪圈。必须豁达，现在又不能奢谈豁达——

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双眸热烈注视下的复旦园里，人们自然豁达；

在从杨建文的两个“三级跳”里领略了强悍，看到了标识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人们可以豁达；

在有了一块独立、公正的小小天地进行角逐与较量的大连工学院，人们应该豁达。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如复旦大学一样在时代的银幕上被常取近景、特写；

并不是所有的人的心态都如上海社会科学院领导者们一样，对木秀于林者施阳避阴、催花引蝶；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如大连工学院一样，有着一块尽可

能排除人们实际水平之外的因素从而进行公平竞争的小小天地。

于是，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犹如一枚既甜又酸、既润又涩、难吞下又吐不得的果子，放进了中国的嘴里……

本文也有了题目——《神州“大拼搏”》。绝非作者故作危言耸听状，因评聘职称而搅得更加五光十色的生活，也许是被挤得实在喘不过气了，硬是自己热汗腾腾地蹦到了我的篇首……

三

申报高级职称，得有发表了的文章。有一些地方，就是中小学教师也得如此。

在中学教语文的A君就碰到了这个难题。除去睡眠，吃饭，每周12节课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掷在了教案和学生们一摞摞厚似砖块的作文本上。前年，该市职称评聘工作刚开始试点，他觉得一板一眼讲了20年别人文章的自己也得交出文章来。花了四个星期天，又熬了三个通宵，他写了两篇共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学语文教学法革新之我见》和《漫谈论说文的写作》。再谦恭又不失卑微地写了两封信，信末附上妻子工作单位的地址，连同文章寄出去了。三个月后，前者如泥牛入海，黄鹤杳然，后者退了回来。

百般无奈，他去找了过去的学生P君，现在该市的晚报做副刊编辑。P君请老师给报纸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短文。又说起一位大学同学在外省某刊物任编辑，此人有“新潮”癖，若老师有合适的东西，自己可以推荐。A君回到家，先翻出

《漫谈论说文写作》的底稿，结合《文艺研究新方法》一书，连续三夜挑灯删改，题目改为《运用系统原理进行论说文写作》。文内，“增熵现象”、“反馈角度”、“圆心结构”、“二重对位模拟”、“证同效应”、“逻辑式的悟性”……几乎排山倒海。其块垒、艰涩之状，连A君自己也不忍复读，他似乎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境，硬着头皮写了下来。次夜，轻轻松松了，书架上取下唐诗一册，翻到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先作描摹，再来品味，不几下便滑向了结束语：“这首小诗传达出的幽静美，犹如一支精美的‘小夜曲’，清心悦耳，沁人心脾，使你感到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撩拨你更加热爱生活的情思。”

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了。A君得以在职称申报表上增加些份量，口袋里也装了几十元钱的稿酬。他却有些悻悻，仿佛那分量是一堆乱砖，说倒便会哗哗地倒下来；这钱，也好似是从别人的口袋里窃来的。P君劝他，“老师，您何必愧心？告诉你，好些文章都是这般出笼的，评这一回职称，中国共制造了数十万篇文章……”

申报中高级职称，在高等院校得考外语。除去教古汉语和古典文学的，似乎谁都不能幸免。B君是教写作课的。中学时代学了六年俄语，随着中苏交恶、“反修防修”，几千个单词，连同一堆语法，早交还了伊凡大叔。1977年考上大学，已是30岁的人了，上了二年英语。任课的教师是一位二十几岁、留校不久的姑娘，不知是站在讲台上望着下面一片精明练达的目光有些胆怯，还是看到一张张胡子拉茬、皱纹丰富的脸生出侧隐之心，她教得马马虎虎，B君一班人学得也马马虎

虎。现在居然要考的是许国璋主编的《大学英语》第三、四册，B君惶惶然，忿忿然了……

某校某系。系里分到了三个正教授的指标。C君是1981年升的副教授，近几年来带着三位研究生，还出版了四本专著。他觉得这回晋升正教授自己应该笃定，可一深想，又觉得还有些玄乎。系里1981年升的那批副教授还有五位，系评审组里，投票若不相对集中，自己便有可能在一片乱箭之中倒下……

C君不是学心理的，现在却必须是位心理学家。C君不是学军事的，现在却颇为熟稔《孙子兵法》。

一天晚饭后，他散步，碰到了也在湖边散步的J先生。J先生早已是正教授，无需为职称食不知味、夜难成寐，他有点担心的是夫人。她从外校调来本系尚不足一年，这回申报的是教授，偏偏自己又是系评审组组长，不便在评审会上介绍她的业务情况……几句寒暄后，C君说：

“昨天，我拜读了尊夫人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那篇大作。唉，您老怎么早不说起呢？我是偶然才翻到去年那一期的。功底厚实，行文严谨，气象恢宏，见解拔俗，乍看难想象这出自于一位女同志的手笔。”

J君摇头不迭，半是澄清，半是谦和：“哪里，哪里，您过奖了。此文是她自己做的，待发出来，我才知晓。我以为，文中《道德经》的几处注释欠准确，关于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阐述也还可以斟酌……”

“系里的副教授中，有尊夫人这样水平的恐还不多。您老有些求全责备了，这里讲讲倒无妨，评审会上这么讲，我第一个通不过……”

俩人分手时，J先生迎满湖荷风，徐徐地舒了一口气。

次日晚饭后，C君散步碰到了也在林荫道上散步的K君。K君比C君小七岁，今年还只48岁。从他的从容方步上，他的饱满天庭上，似乎都透射出一股灼人的自信：自己将会是学校里最年轻的教授，令人瞩目如同1981年那次自己成了学校里最年轻的副教授。C君感觉到了K君深甸甸的自信，K君也得承认C君的实力，否则俩人不会不经过一阵铺垫便直奔“主题”。

C君道：“老弟，想过没有，系里评审这一关，若票数分散，该升的升不了，不该升的又升了，那可就啼笑皆非……”

K君快人快语：“不会。昨天我在街上听到一句俗话：钱不会走错路，钱涌去的地方总是好地方。票也不会找错门，票数集中的人总是该升的人。”

“也许是我过虑了。象你，是谁都该投票的。”

“彼此彼此。你老兄，也是谁都该投票的。”

投票了。C君先在自己的名字上义无反顾地画了一个圈。紧接着是J先生夫人的名字，他没有画；接下来K君的名字，他仍没有画圈。如果说前一个圈没画，他还为心灵的暗影里猛地窜出的那个魔鬼竟有如此强悍的力量而感到吃惊和不安；那么后一个圈没画，他心里生出的倒是一阵明彻的快意，他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向K君的自信作了不显山、不露水的挑战。C君的票上，被画了圈的是另外两位在评审会上已经争议很大的教师。

应该说，C君的算计颇是精明。结果出来了，如他所企，在七位评委里他得了七票。J先生的夫人得了五票，名列第

二，这使他刚才为伤害了一位厚道的老先生而愧疚的心，一下恢复了平衡。C君也有疏忽，他原以为K君的水平与成绩结结实实摆在那里，再怎样也能过半数。他不投K君的票，无非是不愿锦上添花……结果却是K君非但未过半数，而且只有一票，这一票是谁投的，不言而喻。

对C君来说，他没有料到伟大的马克思说过的同样伟大的一句话：“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竟如此鲜明地在K君身上应验了。看来在系里，对K君常常写在脸上、溢在眼里的那种自信感到不是滋味的，不仅仅是自己。对K君来说，这些年他热情关注神州大地上的变革，在教师们讨论“十三大”文件的小组会上，在课堂上讲起中国当代文学曾有过的种种惨痛时，他未少呼吁过加快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眼下，“民主”真到了他的头上，即便是打落了牙齿，他也不能不往肚里吞；能够往外冒的，唯有对C君的一腔愤怒。人尚未走，会尚未散，他猛地站起来，冲着C君嚷道：“你是个犹太！”

C君依然作为正教授报去了校评审委员会审批。可跑得正欢的一个轮子却扎进颗不小的钉子，连J先生都闪过如此的念头：莫非老伴差的两票里，也有他的一票？

J先生还是校评审委员会成员。

是的，凡是利益所趋处，总是弊端百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不能因此而放弃考察眼前的诸种弊端。历史的巨大惰性，犹如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在一圈磨得发黑的碾道上缓缓地走了几千年。那惰性，常常不是别的什么，正是重重弊端的延续，延续的重重弊端。

当代中国改革的使命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向历史的巨大惰性挑战，并与它作出尽可能彻底的决裂。

四

既然称之为“大拼搏”，卷进去的人们就应该有比较普遍、共同的心理契机——

与职称紧紧挂勾在一起的：

有工资。在八类地区，教授的起点工资是 180 元，副教授为 150 元，讲师为 120 元；

有住房。以复旦大学为例，分配住房实行打分制。除每位教师的工龄、教龄、家庭人口等都折成分数外，职称也折成了相应的分数，教授是 25 分，副教授为 20 分，讲师则 15 分。积分越高，住房条件越好；

有公差待遇。评上了教授，50 岁的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坐软卧、飞机；未评上教授，就是耄耋之年，只能坐硬卧，若硬卧的票子买不到，又舍不得花大价钱去找“倒爷”，即便是从广州到哈尔滨，那也只有屈就去挤硬座；

有子女前途或家属户口。中级职称以上者，可以照顾一名子女就业。妻子若在农村，可以调来城里吃商品粮；

在不少单位，职称间的差异，还表现在医疗条件的不同和书报费的多少上。

职称，一个按本义理解应该是体现人们学术水平、业务水平的称号，一个在熙熙攘攘的物质世界里最应该保持自己独立性的称号，如今与厨房里的柴米油盐搁在了一起，与车厢几乎厚成一堵墙的汗味、烟味靠在了一起，与夫妻们团圆

的欢欣和天各一方的孤苦连在了一起……

在1985年复旦大学进行的那次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人主张职称评定应该实行双轨制，即职称不与工资等生活待遇挂勾，是什么水平，授予什么称号。至于工资，可以国家有多少钱，就支付多少钱。

在一个尚贫瘠的国度，又逢一个百废待兴、欠账太多的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这一心理——看重职称带来的物质利益甚至超过职称所代表的实际水平，是可以理解的。职称是独立的，崇高的，崇高得不容世俗烟火的玷污，不受一些金钱味儿的锈蚀，那将是明天的事。可在今天，我们还得继续蒙受历史的惩罚。

职称，犹如上公共汽车，去北京、上海街头看看，几乎啥时候，车上人都是满满的。挤上去了就上去了，要挤不上去，那就得等到牛年马月。

1956年，我国曾开展过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六十年代初又着手建立职务等级工资制，但未能全部实行。因此，1956年的评定应是第一次，直至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才决定再次评定职称。这可以算是第二次，只是参加第一次评定的年轻人，此时由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落成了午后一、两点钟的太阳；而当时的中年人，已经蹒跚地走进了苍茫的暮色……

五十年代的大专以上毕业生；
六十年代的大专以上毕业生；
七十年代的大专以上毕业生；
八十年代的大专以上毕业生。